

七零后的人到中年

——评唐珍名《时光在陪伴中重生》

孙大志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0)

[摘要]唐珍名的《时光在陪伴中重生》记录下了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在不经意之间向我们敞开了一名刚刚步入中年的七零后知识分子的心扉。与谌容《人到中年》进行比较阅读,《时光在陪伴中重生》反映出来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其形成了一种跨时空的问答。

[关键词]《时光在陪伴中重生》;四零后;七零后;知识分子;中年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6-0007-04

Men Born in 1970s Coming to Their Middle Age

——On Tang Zhenming's *Time is Reborn in Companionship*

SUN Daz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Tonghua, Jilin, 134000 China)

Abstract: Tang Zhenming's *Time is Reborn in Companionship* records his life sentiment, which inadvertently opened to us a middle-aged intellectual's heart, who was born in 1970s. Through comparative reading, Tang's *Time is Reborn in Companionship* and Chen Rong's *Middle-aged forms* an answer-and-question relationship across time and space with the thoughts of intellectuals reflected in the book.

Key words: *Time is Reborn in Companionship*; men born in 1970s; intellectuals; middle-age problem

作为一部博客文集,唐珍名的《时光在陪伴中重生》虽然没有明确的写作思路,也没有起伏跌宕的冲突,但随笔式的有感而发,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七零后知识分子的内心。品读唐珍名的《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不由得将这位七零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感受与谌容的《人到中年》联系起来——越往下读,竟越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七零后对《人到中年》提出来的社会问题的重现:如果说《人到中年》讲述的是1979年知识分子的危机问题,那么35年后的今天,中年知识分子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时是怎样应对的?当下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有哪些提高?35年前中年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什

么,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又心系何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人到中年》讲述的是1961年大学毕业的陆文婷的故事,推算起来陆文婷应该是1937年左右生人。属于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这一代人,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统称为四零后。这代人之所以特殊,之所以被称为一代人,是因为他们是在解放前出生,解放后学习,文革前参加工作。这些特点让他们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的一代人。他们之前的人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他们之后的人求学过程被文革打断。然而他们的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基础扎实,教学严谨;自己

收稿日期:2014-09-15

作者简介:孙大志(1973-),男,吉林四平人,通化师范学院教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民间文学。

则生在旧社会,有着战乱中苦涩的童年;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血管中涌动着革命的激情。遗憾的是,这一代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遇到了文革,不是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被连累,就是赋闲在家哄孩子。满腔的报国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冷却过程持续了整整十年。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知识分子的参与,他们重回社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但是繁重的工作、家务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同时,领导阶层仍旧蔓延着官僚主义,他们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于是,这一代人的压力和诉求在《人到中年》中集中爆发出来。他们已经被社会、家庭的重担压得奄奄一息,迫切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关心。

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任何国家里都是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谥容关注的四零后因为处于特殊的历史节点,而被凸现出来。由于人才断代,这批人绝大多数直到退休仍坚守在重要岗位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成长起来后,这一代人才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代人,他们的青年时代是在动荡中度过的,但总体来说,他们的一生是在确定中走过来的。他们用一生诠释了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关心集体、牺牲小我就会修成正果,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

今天的七零后,同样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五零后和六零后不同,他们没有深度参与文化大革命。他们多是文革后开始入学,没有浑浑噩噩、动荡不安的青少年。与八零后也不同,他们大学毕业后也多是分配工作,没有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可以说七零后在成年之前,社会为他们提供的人生道路基本上是确定的,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好,工作、生活都可以有保障。然而成年之后,随着下岗潮等社会现象的出现,改革开放逐渐深化,市场经济日渐成型,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

一 家庭不再是负担

对于陆文婷和傅家杰来说,家庭负担无疑是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四口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三个人轮流使用一张仅有的三屉桌;使用蜂窝煤炉,做一顿饭顺利的话也要50分钟;孩子生病无人照料;孩子午饭没有人做。这些问题是《人到中年》中体现出来的,实际生活中的四零后的确孩子无人照料,他们并非没有父母,而是他们的工作是组织分配的,大多与父母不在一个城市,或者父母在农村,

他们无力把老人接来帮助照看孩子。相反,父母还需要他们贴补家用。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困顿。

然而在35年后的今天,唐珍名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在《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中,作者是一名高校的中层领导。作为一个七零后,唐珍名的工作轨迹是简单而具有代表性的。他出生在农村,经过努力学习,考入省城的著名高校,毕业后留在学校从事行政工作,逐渐升职。这种情况在七零后为数不少,至少现在看来是一条令人羡慕的稳定的人生轨迹。但是同样作为一个七零后的我,知道他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艰苦时光。当初的大学老师并不像现在这样光鲜,甚至曾经被看作百无一用。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个工人可以利用工厂里的边角余料为家里做许多事,可以用来结交朋友,而老师除了粉笔,什么也没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依靠微薄的工资来购置,实际生活水平非常低。像唐珍名这样能够坚持到全民重视教育,教师地位大幅提升,教师工资“连滚带爬”往上涨,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的事情,此前的大学教师生活相当的清贫。

不管经历过怎样的艰苦,毕竟七零后的知识分子没有遇到文革那样的“人生休止符”。工作经验、工作能力,都毫不含糊地累加到他们的履历上面,职位必然得到提升,工资注定越长越高。于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负担在他们的中年时期没有形成太大的压力,或者说,在经济上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压力。房子已经不是问题,从孩子有自己的卧室,男主人有自己的书房,就可以感受到《人到中年》中“三屉桌”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老人生病了,无非就是把买车的计划推后一些,这种比较大的家庭开支也是可以应对的;岳父坚持要到老家过年,可以看出七零后的知识分子对老人的关怀和照顾已经达到一个比较细腻的水平。唐珍名的作品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就是他为孩子买运动鞋。“他看中了耐克,我不肯。他问我为什么?说了一大堆理由,并强调他们班上某某某都穿了这样的鞋。”^[1]

作者不买孩子想要的比较贵的名牌,选择普通的鞋,买了两双,是想用这种方式避免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在恍惚之间惦记着给圆圆买白球鞋。“给圆圆挑一双吧,他脚上的鞋早已破了。给他买一双白球鞋吧,他会高兴一个月。”^[2]孩子的鞋已经磨破了,她总是忘记给

买双新的。与陆文婷的愧疚相比，唐珍名买鞋关注的不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经过35年的社会进步，中国中年知识分子已经摆脱了物质束缚，开始真正的精神探索。但是，物质丰富的同时，他们对精神的探索深入了吗？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二 不确定性导致的关注位移

在谌容的《人到中年》这部作品中，工作、事业一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题。陆文婷病倒了，是工作强度大累倒的；傅家杰要搬到单位去住，是工作太重要，不得不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三屉桌不够用，是因为夫妇两人都要用它学习、写论文。文革让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停滞了，新时期高强度的工作需要，促使他们拼命地学习以适应工作的需要，拼命地工作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拼命地工作，在他们的心目中事业是第一位的。陆文婷的好友姜亚芬代表着另一种选择，他们夫妇选择了出国。从她给陆文婷的信，和她的丈夫酒后一席话不难看出，他们做出的是自己都鄙视的选择。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的道路是确定无疑的，区别只有选择战斗还是选择当逃兵。前者无疑是受到充分肯定的，后者则是前者的可悲的参照物。四零后的这一代人，从出生到退休，绝大部分时间处于确定的时代之中，那是理性至上的时代，是追求真理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的意义不需要探讨，它体现在毫无保留的奉献中。只要你肯奉献，必定会得到回报。动摇和怀疑只会延误他们走向成功，没有实际意义。

对于人生目标追求的确定性，让他们对子女教育问题只字不提，因为那是教育工作者的职责。他们相信教育工作者也在和他们一样，抛家舍业，不辞辛苦的、忘我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他们子女的教育工作中。他们的子女也是同样坚信，生活苦一点，学习累一点都没有什么，只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就会分配工作，生活就会有保障。

然而在唐珍名的生活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他的儿子唐朝。《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一书，从书名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父爱。此书以孩子害怕单独睡觉开头，其中详细讲述了一个七零后的父亲记录下的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笔触细腻得直逼张爱玲。在读到作者目送儿子单独过马路的那一段时，孩子的身影在车流中时隐时现，一会消失，一会又冒出

来，作者悬在嗓子眼的心提起、放下再提起，让同为七零后的我深有感触。与我们的童年相比，子女在我们的眼中似乎更像一个低能儿，但这种担心确是共同的。看看如今的中考、高考，几乎是全城总动员，出租车免费送考生，警察为迟到的考生开道，考场路段禁行，考场附近禁止鸣笛放炮，电台反复提醒考生不要忘记带证件，遇到问题如何应对，考场外如游行示威一般的父母等等。这些现象足以说明七零后对孩子的重视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再回到唐珍名的书中来，这本书对作者的工作、事业着墨不多，而且很零散。没有陆文婷的手术、傅家杰的金属材料那样具体，大多与社会生活有关，如同事关系、接待工作、宣传工作等等。

是什么原因让中年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从事业转移到子女身上来的呢？是不确定的未来。前面我们提到过，七零后们有着确定的童年和青年，然而当他们即将步入中年的时候，社会变了，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了“东马”和“西马”，真理成了相对的；成功不再只凭努力，更多的要靠机遇；职业不再是神圣的，成了混饭的工具。竞争这个字眼对于七零后而言，原本只是用在同事身上的，现在他们的孩子面临的是全社会的竞争、物竞天择的市场经济。这让七零后如临大敌，竞争是他们的弱项，因为他们一直受的是确定性的教育，从事的是确定性的工作，而他们孩子的命运却不会这样。于是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孩子身上，只有这样当孩子竞争失败的时候他们才无愧于心，因为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三 两代人的宿命

对这两部作品比较进行耐人寻味，陆文婷的故事发生在1979年，她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正是唐珍名和我一样的七零后。时隔35年，两部作品就像两代人的隔空对话。陆文婷似乎在问唐珍名，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呢？唐珍名也许会回答，如果我像你们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许会饿死的。

父辈和子辈，这两代人在这两部作品中倾诉着自己的关注、自己的价值观。七零后的童年是在被忽略中度过的。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来看，七零后对子女的关注似乎有代偿性补偿的成分在内。至少我在给孩子买玩具的时候，脑海中总会浮

现自己小时候在儿童玩具柜台看别人挑玩具试玩时艳羡的神情。儿子破坏玩具往往会使我“出离愤怒”,这似乎也是自己情绪深处的某种东西在作怪。而我的父亲,一位四零后的退休教授,对孙子的溺爱,仿佛也有一些说不清的情感因素,对于长相与他的孙子几乎完全相同的童年的我,他的严厉至今想起来还会令人后背发麻,这是不是也是他对中年时忽略儿子的一种补偿呢?

七零后对孩子的关心和重视有时甚至是病态的。因为他们与之后的八零后不同,七零后在确定的环境中完成学业,八零后从中学开始就明确被告知大学毕业后不会分配工作,后者从学习到进入社会都是在不确定中度过的。七零后没有应对不确定性的求学经历,导致他们视竞争如洪水猛兽。为了让孩子做好准备,他们不惜牺牲一切。孩子在学习、生活中的每一个成就,都被七零后视为自己为儿女参与社会竞争做好了铺垫;同样孩子每一个弱点,也都被他们放大,当成“阿克琉斯的脚踵”。这种病态的关注与七零后对童年的补偿合并,造成七零后对子女的过度关心。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全部精力放在子女身上,自然会造成七零后对工作的敷衍。工作不再像四零后一样被当作事业,倾尽全力去做。对于七零后来说,工作仅仅是饭碗,没有必要做得尽善尽美,那样甚至可能会得罪人。因为这是一个全社会都把关注点放在孩子身上的时代:工作可以平庸,孩子必须出众。只有这样,他们自己的才能才会被社会间接承认,自己和家庭才拥有未来。孩子的生活要亲自指导,孩子的学习要亲自辅导,孩子的个性要亲自培养,孩子的缺点要亲自修改。原来四零后全部推给社会的事,七零后都要亲自来做。一方面,他们认为全社会的社会角色都在“混”,他们信不过现有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他们相信自己是过来人,有许多经验和教训要付诸实践。于是《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为我们提出了七零后人到中年时面临的新问题,即怎样才能让他们从对孩子的病态关注中回归到社会角色中来?就像陆文婷和傅家杰被生活琐事所累一样,唐珍名这样的七零后也是

我们社会的中坚,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一个孩子的培养上,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提高中小学教育水平?细化中小学的心理辅导?促进教育公平?做好这些能让他们信任我们的义务教育体系,把精力重新放到自己从事的社会工作中来吗?我想这还不够,只有全社会每个人,包括唐珍名自己,都有了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才有可能让每个人放下包袱,这是当下中年人面临的新问题。《人到中年》中提出的问题是中年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他们生活的全部负担说到底是个经济问题。经济待遇的提高有赖于社会财富的增加,改革开放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改革开放带来的不确定性,又让《时光在陪伴中重生》的七零后的中年人把精力投入到家庭中。也就是说,35年后,中年知识分子们的经济待遇提高了,生活负担减轻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全部身心放在工作上,因为子女教育又成了新的负担。这似乎是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四零后与七零后,这独特的两代人,他们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却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四零后是挣脱了混乱和血腥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七零后是平稳无忧之后被抛入一个未知的时代。是计划经济的确定性成就了四零后,也是计划经济的崩溃迷茫了七零后。历史还在前进,中年仍会到来,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年即将接踵而至。中年人的关注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期待着下一本《人到中年》或者《时光在陪伴中重生》来回答。

参考文献:

- [1] 唐珍名. 时光在陪伴中重生[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2.
- [2] 谌容. 人到中年[M]//谌容. 谌容中篇小说集.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389.

责任编辑:黄声波